云南航空学校的来龙去脉

金妹

云南航空学校创办于1922年，该校以“航空救国”为核心办学理念，在短短10余年间培养出200多名航空人员，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了中国的航空骨干力量，对中国早期航空事业的发展和人才储备做出了重要贡献。

◀云南航校师生正在进行教练机起飞前的检查

唐继尧主持筹办

1918年前后，北洋政府兴起向外国借款，大办航空之风。受此影响，各省军阀也开始兴办航空事业。

1922年春，云南航空学校开始筹办，校址设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内，同时把昆明巫家坝陆军大操场开辟成飞行教练场，并组织人力在巫家坝用石碾子平出跑道，还在巫家坝拨出滇军陆军营房作为飞机修理厂的厂址。1922年秋，唐继尧成立了一个云南航空处，任刘沛泉为处长。航空处下设两个飞机队——以广东华侨王狄仙、张子璇分任队长，华侨黄社旺、庄孟仙、司徒鹏等为飞机师（1923年冬，唐继尧取消航空处改为航空队，任留学法国冶金专业的柳希权为队长，留学美国土木工程专业的段纬为副队长）。

经过紧张准备，云南航空学校于1922年12月25日正式成立，由唐继尧为督办，刘沛泉任校长，飞机第一队队长王狄仙兼任教育长。航校设飞行科、机械科两个学习科目，学制为两年（入伍训练半年、航空训练1年半），毕业时颁发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证书。

前后四期学子

第一期航校学员主要面向昆明、贵阳招生。从昆明择优录取了杜卿、陈栖霞、周祖承、李发荣、李嘉明、王嘉缓、邱俊、陈广福、陈文华、陈麟书、徐元敏、刘尧、赵安国、禹开奎等十余人；又从贵阳择优录取了张汝汉、张有谷、晏玉琮、张丕兹、曹文瑄、黎世宣、王锦胤、魏鸿钧、徐蕴石、刘从仁、刘重伦、陈培顺、邓希岳、张实斋等十余人；后又录取了夏文华（女）、尹月娟（女）、权基玉（朝鲜籍，女）、李英茂、张志日、李春等学员。

航校在昆明招生时，曾发生了一个插曲——听到航校招生的消息后，云南各地有志青年踊跃前来报名。但就在报名当天，航校的两名教官（王狄仙和张子璇）驾机飞行时意外坠落，虽然两人均无大碍，却给目睹了此次坠落事故的报考者造成了不小的冲击，许多已经报名的云南青年立即要求退出。面对退缩的考生，唐继尧马上选送两位昆明本地姑娘夏文华、尹月娟来到航校报名，然后对众多男报名者大声说道：“你们自己瞧瞧嘛！连女娃娃都不怕死，专门来学航空，要驾飞机上天，男生还怕死吗？”经过唐继尧的“激将法刺激”，不少要求退出的青年又参加了报考。

云南航空学校以“航空救国”为办学核心理念，学制为两年，其中一年半即3个学期在学校学习文化及专业知识，航校的第一期新生入学后一律编为讲武堂第十七期学员，学习飞行课程前，首先要到云南陆军讲武堂接受半年严格的入伍生训练，军事科由讲武堂第十七期各科教官讲授。在第四学期，学员才能到巫家坝机场进行机械操作和驾机飞行训练。由于向法国订购的教练机交货不及时，教学实习再三拖延。

1925年12月第一期学员终于毕业。全班飞行考核合格顺利毕业的有张汝汉、张有谷、陈栖霞、晏玉琮、杨嘉漠、郭其宣、李嘉明、李发荣、李英茂、权基玉、赵安国、刘重伦等12人，其他飞行考核不合格的学员全部改学机械科。学院毕业后，多被分配到航空队任职。

1925年冬，航校第二期学员开学，该期从昆明各中学招录李怀民、王汝福等学员共计40人，一切训练计划，与一期相同。

此时，从德国学成归来的滇籍飞行员段纬兼任云南航空学校校长，又选拔了云南航校第一期毕业生中的张有谷、张汝汉、晏玉琮、李发荣、李嘉明、陈栖霞等人为航空学校的飞行教官和机械教官，然后逐步辞退了法国飞行教官和越南籍机械师。1926年北伐军兴，北伐军东路军攻克杭州后，组成了“东路军航空司令部”，任命刘沛泉为司令。刘沛泉即电调张有谷、晏玉琮、张汝汉、权基玉等任国民革命军东路航空司令部航空队飞行员，参加北伐。

1927年2月，龙云执掌云南军政大权后，继续开办云南航空学校，第二期飞行生于1928年8月毕业。后龙云将刘沛泉、陈栖霞、张汝汉等栖身北伐东路军航空司令部的部分云南航空学校旧班底请回云南航空队，并指示航空队继续招收两期航空飞行学员。由于云南连年用兵，财政赤字大，其空军规模始终很小，到抗日战争前夕，云南航空学校仅有飞机20余架，且多为教练机。

云南航空学校在短短10多年间共举办飞行班4期、机械班2期，培养航空人员200多名，其中飞行班结业142人（含女飞行员13人），机械科结业100人。

毕业生多数成为中国航空事业的骨干

云南航空学校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航空人才，该校毕业生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了中国的航空骨干。5个国民党中央航空队中，一、三两个航空队中的大多数飞行员都是云南航空学校培养的，其中晏玉琮成了国民党中央空军第一航空队队长，抗战前升为国民党中央空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有谷则是国民党中央空军第二航空队队长，抗战时提升为国民党中央空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值得一提的是，1929年，云南航空学校的第一批学员陈栖霞、张汝汉和教官刘沛泉，到香港九龙机场接飞机后飞往北海，再由北海飞回昆明，在没有任何导航设备的情况下，完全靠肉眼判断地形、风速、方向，以6个小时飞完从沿海到云岭高原900多公里的航程，飞出了当时国内最长也是自然条件最为复杂的一条航线，引起了全国航空界的高度关注。

1928年，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筹备开办商业航空，设立云南省商业航空筹备委员会，并提出以昆明巫家坝机场为中心建立云南省省内航空网的计划，民航部分分为四期建设。为此，龙云派人分别从美国和法国购进两架小型客机，命名为“昆明号”和“碧鸡号”。1935年5月渝昆航线开通，一架美国4-AT型飞机从重庆起飞至巫家坝机场，标志着云南巫家坝机场正式开始民航业务。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后改名中央空军军官学校）从杭州迁至昆明，接管了云南航空处、航空队及停办的航校，云南航空学校原教职员及学员也被分别安排到中央航校柳州分校、南京航委会、各战地场站、修护补给及工厂工作。此后，云南航空学校不复存在。在全国统一抗战的形势下，国民党中央航空委员会抽调云南航空队飞行员张汝汉等32人到南京参加抗战，建立了十多年的云南空军也就此淡出历史。

抗战期间，云南航空学校的毕业生纷纷赶赴抗日战线，空战和地勤的学员都怀着爱国之心，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中恪尽职守，坚持到抗战最后胜利。据有关资料披露，抗日战争期间，晏玉琮任航空总指挥部参谋长，先后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参与指挥空战。1937年8月14日，日机由台湾起飞偷袭杭州空军基地，晏玉琮参与指挥，令空军第4大队高志航大队长率战机追击，一举击落敌机6架，创下抗日空战中著名的6:0战绩。1937年8月22日，第6大队组成夜袭游击队，由支队长陈栖霞、副支队长李怀民、参谋吕志坚各率2架战机，在华东地区执行夜袭日军阵地的任务，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1938年9月28日日军空袭昆明，两架云南航校的黑色双翼的小飞机升空迎战，驾驶员为航校高级驱逐组组长陈友维和他的同学黎宗炎。空战中，敌机一架被击中后向东南方向坠毁，敌投弹手跳伞被活擒。不久，这架敌机的残骸被解送至昆明展览。抗日战争后期，以晏玉琮为主的云南航空学校毕业的空军军人，协同陈纳德组建的美国“飞虎队”，以及后来组建的中美混合大队，联合对日作战，保障了抗战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被称为“死亡之谷”的驼峰航线运往中国。同时，他们还协同陆军联合作战，打通了中缅公路，取得了滇西战役的伟大胜利。

1949年底，以时任云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云南航空学校第一期学员张有谷，时任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第四十三补给分区参谋长、云南航空学校第一期学员张汝汉为代表的云南航校学员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号召，于1949年12月参加了昆明起义，为云南大部地区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到昆明招收航空教官，云南航空学校多名毕业生入选，分赴祖国各地参与新中国航空人才培训，如：解放军牡丹江第七航空学校副校长张有谷、北京南苑航空学校飞行学教官颜士琦等，他们为培养新中国自己的航空人才做出了积极贡献。

（作者系云南省文史研究者）

解放军三十一军勇夺周浦

贾晓明

1949年5月5日，人民解放军三野第七、第九、第十兵团及第八兵团一部共8个军，完成了对上海地区的大包围。

5月8日，第三野战军总部决定第十兵团第三十一军改归第九兵团指挥，参加浦东作战。第九兵团交给第三十一军的具体任务是：在浦东作战的第一阶段，迅速攻占周浦，胜利后会同第三十军夺取高桥，直插三岔港，封锁黄浦江，切断敌人海上退路。

接到命令后，三十一军军长周志坚立即向各部传达上级指示，并要求部队边走边进行战斗动员，边走边做好战斗准备；同时，派出侦察营对浦东地区进行侦察。第三十一军经过6天的跋涉，于5月14日到达浦东地区的奉贤、南汇一带，进行攻击准备。

在研究了浦东的敌情和地形特点后，周志坚等军领导决定：派第九十一师夺取周浦镇。周浦镇是国民党守军在浦东外围阵地的一个重要据点，由敌二〇四师六一二团(欠一个营)和敌江苏省保安第一、二旅及部分地方武装3000余人防守。第九十一师受领任务后决定：由二七一团从镇西北攻入，二七二团从镇西南、二七三团从正南配合二七一团实施攻击。

5月15日下午，第九十一师部队沿奉贤、航头，冒雨急行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抵达周浦外围。随后，各团按照预先部署，占领了周浦镇外围，将周浦镇包围起来，并切断了守敌的退路。

第二七一团第二营和侦察分队作为师先头部队，提前出发。该部一路隐蔽前进，严密封锁消息，排除小的情况干扰，迅速向周浦镇接近。国民党守军虽然派飞机多次进行侦察，却完全没有发现九十一师的踪迹。15日深夜，先头部队到达周浦西南萧家楼时，与敌两个连遭遇。二营当机立断，以快速动作先敌开火，打了国民党军一个措手不及。接着，侦察分队从侧翼向敌人发起攻击，与二营形成合击之势，很快将这伙敌人全部歼灭。

16日凌晨4时，第二七一团三营神不知鬼不觉地抵近周浦镇西车站。担任主攻任务的八连尖兵在站前一独立房屋处抓获了一名敌流动哨，经过审问，掌握了敌守军的部署。经过激战，三营用20分钟占领了敌人的车站仓库和附近阵地，击毙敌人300余人，并通过俘获的一名敌排长向残敌喊话，迫使残敌投降。

与此同时，第二七三团二营推进至萧家楼东北面的朱家宅，正要攻击一个桥头阵地时，守敌从碉堡里打出一面白旗。部分战士前往受降，却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团领导立即下令部队实施强攻。战士们以密集火力压制敌人火力，并派爆破队匍匐前进至敌人的碉堡下，随着4个炸药包同时爆炸，碉堡和里面的敌人全被消灭。

经过激战，九十一师各团全部突破敌人防线，冲入周浦镇内，和敌人展开激烈巷战。国民党军节节败退，防线不断向镇中收缩。

17日晨，第二七二团与第二七一团在镇内会师，解放军控制了周浦镇大部分地区。残敌则凭借镇内坚固的楼房居高临下射击，企图固守待援。当九十一师战士从太平弄、竹行街向大济桥进军时，遭到敌人设置在大济桥一座楼上火力点的火力封锁，前进一度受阻。一名身手敏捷的解放军战士纵身跃入河中，悄然潜水至楼房的背后上岸，攀登上楼，一举将楼上的敌军机枪手击毙，为战友们扫清了前进的障碍。

又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九十一师指战员将镇内敌人阵地逐一夺取，残敌被迫退入镇中制高点——一座多层高楼中。大楼建筑坚固，敌人在各层设置了交叉火力，向外疯狂射击，解放军几个分队发起几次攻击均未奏效。第九十一师师长高锐闻讯后派二七一团参谋长郑戈前往统一指挥，集中力量打掉了楼中敌人第一、第二层的火力点。随着解放军战士发起最后的猛攻，大楼内的敌人全部举手投降。

战斗结束后，解放军清点战俘，发现其中没有敌团长。原来，敌团长自感大势已去，在解放军攻入周浦镇内后不久，便丢下部下，伙同敌县长改扮成老百姓，躲进镇北民房，企图乘乱逃走。在解放军战士的严密搜捕下，敌团长、敌县长被一并生擒。至此，解放军全歼守敌300余人，周浦镇获得解放。

史海观澜 SHIHAIGUANLAN

李延禄以“回马枪”战术破敌

常红

九一八事变后，李延禄受中共党组织委派前往东北吉东地区，任义勇军“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总部参谋长兼补充第一团团长。到任后，他积极团结各方力量，并领导部队进行了反“讨伐”作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1933年1月，李延禄按照中共绥宁中心县委的指示，将补充一团和补充二团三营改编为抗日游击总队。1月中旬，党组织派共青团宁安县委书记李光林与李延禄取得了联系，并传达了成立东北抗日救国军游击军的决定。1月下旬，李延禄等在宁安南部孟寡妇屯召开了东北抗日救国军游击军成立大会，部队下辖3个团，两个独立营和1个游击支队，共有800余人，由李延禄任司令员。成立大会后，李延禄立即率游击军在宁安、汪清、密山等地开展游击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2月10日，部队在团山子屯打击日军后，进入宁安县南部山区八道河子整训。

3月1日晨，日伪军四五百人进犯八道河子。李延禄指挥部队分头迎敌。游击军占据有利地势，和敌人展开激战，打退了敌军的多次冲锋，并给日伪军造成很大伤亡。敌人发现游击军没有重武器后，便用6门大炮向游击军据守的各山头轰击，给游击军指战员造成一定伤亡。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再次发动进攻，游击军指战员冒着敌人的炮火反击，很快弹药也消耗殆尽。面对冲上来的敌人，游击军指战员用刺刀和石块与日军展开激战，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

随着阻击阵地被逐步突破，日军冲进了八道河子屯。李延禄见状，率领部队一面展开阻击，一面掩护群众迅速向后山转移。

日军进屯后，竟以为游击军已被击溃，并没有向后山追击，部分敌人在屯中到处放火、抢掠，其他敌人则把枪架在一起，准备生火做饭。

李延禄在后山经过观察，发现敌人警备松懈，于是下令战士们“准备杀一个回马枪”。由于弹药所剩无几，李延禄便命令将弹药集中起来，交给神枪手。天色转暗后，游击军战士手持大刀、木棒和斧子等武器，隐蔽接近屯子。随着李延禄一声令下，神枪手迅速击毙屯外站岗的敌人。其他游击军则手持冷兵器，呐喊着冲进屯中。

大多数敌人正在吃饭，被突如其来的喊杀声吓得惊慌失措，来不及抵抗便仓皇逃走，逃得慢的，尽数被游击军战士打倒。慌乱中，日军指挥官失足坠马，被从后追来的游击军战士用刺刀击毙。

这次战斗，游击军共击毙敌军200余人，缴获了步枪、山炮等大量武器、弹药以及大批军需物资。

战后，宁安人民向李延禄赠送上绣“抗日游击万岁”的锦旗一面。

史海观澜 SHIHAIGUANLAN

冀中军民南于八村痛歼侵略者

杲学军

全面抗战爆发后，原东北军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拒绝国民党的南逃命令，将所率部队改编为冀中人民自卫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誓师抗日。冀中人民自卫军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支援配合下，对日伪发动游击战，并一举打下了高阳县城，声威大震。

1937年11月，冀中人民自卫军在高阳县进行了扩编。成立了3个步兵团，1个特种兵团。

1938年1月15日，冀中人民自卫军第二团主力袭击了日军石桥据点，在重创敌人后，团长于权伸带领第二团团部和二营转移至高阳县的南于八村休整。

驻高阳县的日军坂垣师团四十二联队第三中队得到消息后，于16日凌晨出动，利用夜幕作掩护，从东、南、西三面对南于八村实施包围，企图对人民自卫军进行“报复”。

16日凌晨5时30分，执行巡逻任务的人民自卫军七连代理连长曹振亭和青年农民刘福兴发现敌情，立即鸣枪报警。于权伸随即发出准备战斗的命令。

不久，敌人在迫击炮、机关枪的掩护下，向村中发起了第一次冲锋。于权伸率领战士们利用有利地形实施反击，并亲自指挥一个连从正面进行反击，两个连从东西两翼侧击日军。很快把立足未稳的敌人逐出村外。

日军不甘心失败，再次组织进攻。他们绕过村子的围墙，沿着村东南角的一条大沟冲进村子，然后兵分两路，一路进攻村南北大街，一路进攻梁家街。

于权伸得到报告后，立即分兵迎敌。当第一路敌人进至三官庙和奶奶庙附近时，遭到埋伏在这里的人民自卫军战士的打击。在两挺机枪的扫射下，敌人丢下多具死尸，仓皇撤退。第二路敌人刚进入梁家街，就遭到埋伏在道路两侧房顶的战士们投下的手榴弹的“迎接”，死伤惨重，勉强抵抗一阵后，也退到村外。

自卫军战士们乘势发起冲锋，在村外和敌人激战。战斗中，于权伸组织迫击炮进行还击，很快就炸毁了日军的电台和迫击炮。南于八村战斗打响后，驻守在北于八村的三营赶来支援，形成内外夹攻之势，战局渐渐出现有利于自卫军的局面。天亮后，驻守蠡县古灵山的自卫军独立营、蠡县抗日五支队等部队也赶来支援，对敌人形成了反包围。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组织下，附近村庄的群众纷纷前来，为自卫军送水送饭、救护伤员。日军发动连续突围，也无法得逞。直至17日3时，残敌才在日军大批援军的接应下，狼狈逃回高阳。

南于八村战斗，冀中抗日军民共消灭日军116名，俘敌7名，缴获掷弹筒一具，机枪一挺，步枪70余支，炮车两辆。此次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华北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和必胜信心，并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开拓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史海观澜 SHIHAIGUANLAN

丹北独立团里应外合拔据点

佟雪辉

抗日战争时期的丹北地区，是苏南、苏中、淮南三大敌后抗日根据地之间的一个独特的重要战略区域。它位于京(宁)沪铁路北侧，西起宁镇，东至锡澄公路，南依京(宁)沪铁路和大运河，北濒长江，包括现今从南京龙潭至镇江、丹徒、句容、丹阳、常州、武进、无锡、江阴等地区各一部分和扬中全县以及苏北邗江、江都两县的沿江地区。

丹北地处长江下游的沿江地带，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交通发达，是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全面抗战爆发后，丹北人民在共产党、新四军的领导下，和日伪顽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巩固、发展了丹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同时，为保障周边各根据地之间人员、物资等的安全往来做出了巨大贡献。

1944年，随着新四军在各战场积极开展局部反攻，5月，中共丹北中心县委奉上级指示，在丹北独立大队的基础上成立了丹北独立团。

丹北独立团连战连捷，多次粉碎了日伪的“清乡”和“扫荡”。随着新四军1944年冬季攻势的开展，中共丹北中心县委、丹北独立团经研究决定：拔除位于扬中本岛中部的老郎街据点，解放扬中县南半部。

战斗打响前，中共丹北中心县委、丹北独立团进行了充分的战前准备，并与老郎街据点伪军第十连连长罗云高取得了联系。罗云高早在1942年初便接受了中共宁沪路北特委敌伪军工作委员会和铁道工委关于民族大义的教育，开始懂得抗日道理；1943年调驻扬中老郎街据点后，与共产党、新四军的关系更加密切。当得知丹北独立团准备攻打老郎街据点时，罗云高表示：坚决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在战斗中率部起义。

11月18日晚，丹北独立团副团长刘德胜率领独立团一连、二连，扬中警卫营、独立团侦通排从根据地出发，于19日凌晨进入预定位置待机。

11月19日午前，扬中县警卫营在内应接应下化装进入伪军营房，逮捕了最为反动的几名军官。上午11时，8名侦察员扮成伪军，进入老郎街伪军据点，罗云高当即集合队伍，宣布起义。随后，罗云高带8名侦察员前往日军据点。当时正值午后，大部分日军在午睡。罗云高等进入据点后，一名侦察员突然抢过敌人的机枪，对准日军扫射，其他队员也拔出短枪射击，很快击毙了据点里的敌人。与此同时，扬中警卫营和独立团二连在罗云高起义部队的配合下，攻占了敌区公所、伪警察局、侦缉队驻地，俘敌200余人。

随后，罗云高和化装的8名侦察员在前，丹北独立团二连、扬中警卫营继进，接连攻克了油坊桥、八字桥、大泡子据点。

当日15时，三茅镇的日军企图夺回老郎街，在途中遭到丹北中心县委敌工部和独立团一连的迎头痛击，丢下携带的几车军用品后向兴隆镇据点逃窜。两小时后，不甘心失败的敌人从兴隆镇据点再次向老郎街袭来，于途中再遭伏击后狼狈逃走。独立团乘胜追击，攻入兴隆镇据点，扬中县随之获得解放。